

中共定能經受兩大考驗 帶領人民邁向民族復興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共產黨。當前，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共所面臨的兩大考驗更加嚴峻：一是腐敗現象愈演愈烈，二是黨風不正脫離群眾的危險日益突出。十八大後反腐倡廉成新一屆中央領導開局的「突破口」，撥正黨風則成為另一個「突破口」。從十八大召開至今，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昭示了反腐的決心。總書記近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同意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包括港人在內的全國人民相信，中共一定能經受兩大考驗，一定能帶領全國人民邁向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這也增強了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習近平從政生涯鐵腕反腐是一大特色

十八大報告用「致命傷害」、「亡黨亡國」來警示腐敗問題的潛在危險。把反腐倡廉必須常抓不懈，拒腐防變必須警鐘長鳴，作為執政黨繼往開來的必修主題課。習近平在接任總書記後，已在不同場合多次對腐敗問題亮劍。他首次亮相，就以「打鐵還需自身硬」來表達反腐決心。總書記反腐言論字字珠璣，擲地有聲，順應了公眾的反腐期待，折射出高調反腐的民心所向，讓人聽之振奮，聞之感慨。縱觀習近平的從政生涯，鐵腕反腐是一大特色。1988年，習近平在廈門副市長的任上被調往福建寧德任地委書記。當時的寧德黨政幹部蓋私房成風，習近平到任後，決心清除這些「擺在馬路邊的腐敗」，據《閩東報》報道，1989年1到9月，習近平就查處441人，其中副處級以上幹部18人，科局級77人，還涉及2000多名官員，在寧德政壇的鐵腕治吏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瀾。習近平主政浙江時，他對吏治要求尤其嚴格。2006年，上海爆發震驚中外的社保基金案，包括前市委書記陳良宇在內的一批政府官員紛紛落馬。習近平被中央派往上海，穩住這艘中國經濟大船的舵。總書記的強硬反腐和過去幾十年的身體力行，給民眾樹立了信心，也看到了希望。

中共絕不會重蹈蘇共覆轍

蘇聯曾經是一個戰勝法西斯德國並第一個把人造地球衛星送上天的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會在一夜之間急劇瓦解？很大原因就是因為腐敗。從赫魯曉夫時候開始，蘇共的領導層就開始了腐爛。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特權階層追求的已不再是單純的金錢利益。這些人開始謀劃長期霸佔特權並傳至後人。他們發現，只有蘇聯變天才能使其既得利益合法化，因此，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出現一大批暴發戶，這些暴發戶大部分人是原來的蘇共幹部。

鄧小平曾明確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這是鄧小平深刻總結中共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反思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教訓後，得出的重要結論。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全體學習時強調：「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盪、政權垮台，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近年來我們黨內發生的嚴

重違紀違法案件，性質非常惡劣，政治影響極壞，令人觸目驚心。」總書記從亡黨亡國的高度強調反腐的重要性，令人相信中共絕不會重蹈蘇共覆轍。

增強了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十八大後強力反腐並不是只有聲音，隨之而來的就是行動。多地政府反腐提速，一些省市不斷有官員落馬。也要看到，隨着反腐鬥爭的深入，中國腐敗現象的主體、形態、領域、手段等都在發生和正在發生着明顯變化。腐敗行為的隱蔽性、利益鏈條的延展性、貪腐手段的多樣性和智慧性更加突出，一般性腐敗問題、嚴重性腐敗問題和深層次腐敗問題交織在一起。十八大提出「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給中共今後的反腐鬥爭開出了「藥方」。

十八大後反貪腐成新一屆中央領導開局的「突破口」，不僅增強了內地群眾對中央反腐倡廉的信心，而且增強了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一國」做到「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不僅對投資內地的港商有更好的保障，而且對「兩制」的感召力、凝聚力會更強。

習式「新八項注意」於細微處見功夫

總書記近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審議並同意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包括：改進調查研究；精簡會議活動；精簡會議簡報；規範出訪活動；改進警衛工作；改進新聞報道；嚴格文稿發表；厲行勤儉節約。規定要求，在出訪活動中，一般不安排中資機構、華僑華人、留學生代表等到機場迎送；在警衛安排中，一般情況下不得封路、不清場閉館；除中央統一安排外，個人不公開出版著作、講話單行本，不發賀信、賀電，不題詞、題字。會議要求，改進作風，從中央政治局做起。這八項規定，令人想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它為中共立下了鐵的紀律，從黨的最高領導人到普通的戰士，都嚴格遵守，始終堅持。它既是中共的行為準則，更成為了人民心中的精神準則，它使中共凝聚起了億萬中國人民，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国的創建。八項規定是習近平總書記為整治黨風官德發出的第一炮，可謂習式「新八項注意」。八項規定從小着手於細微處見功夫，從具體而微漸進進擊大觀，可謂四兩撥千斤，牽微變動筋骨，對撥正黨風化解脫離群眾的危險，意義重大。



楊志強

扭轉內地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陋習

十八大後撥正黨風成新一屆中央領導開局的另一個「突破口」，筆者認為其重大意義還在於扭轉內地社會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陋習。「官本位」思想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陳腐意識，即以官為本、以官為尊、以官為準，傳至今日，已經演變並集中體現為「官氣」，這種現象，也深為港商和港人所詬病。「官本位」思想的核心，是把做官看做人的最高價值追求；「官本位」思想的實質，是把獲取個人私利作為人生的終極目的。魯迅先生曾說過：「中國人的官癮實在太深」，可謂切中時弊。筆者認為，八項規定有利撬動「官本位」思想的沉重積習，回歸以民為本、以民為尊、以民為準，這是民主社會的基本風貌。

美國天然氣供應增加未必惠及香港

周全浩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訪問教授兼香港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美國非傳統石油及天然氣的供應明顯上升，有些人可能覺得，香港及其他亞洲地區因此受惠，享受到較廉宜的進口天然氣，然而筆者對此看法有所保留。

非傳統天然氣是指蘊藏於岩層內較難開採的天然氣，主要蘊藏在頁岩或砂岩這些堅硬岩層的縫隙之間。一般會利用水力壓裂法(FRACKING)開採。透過向岩層注入大量水和化學物，強烈水壓能打破岩層，讓天然氣釋出。

非傳統天然氣供應增加

這種開採技術早於上世紀70年代出現，近年才較廣泛應用，主要是由於技術日趨成熟，加上近年國際油價大幅攀升，因此，生產商願意以較高成本的方法開採石油及天然氣。國際能源署發表的世界能源展望2012報告指出，預計由現時到2035年所增加的世界天然氣供應當中，有50%為非傳統天然氣。美國早幾年開始大量生產非傳統天然氣。2012年美國天然氣價格最低位時，為歐洲進口天然氣價的五分之一，日本進口天然氣價的八分之一，可見美國的非傳統天然氣產量增加，本土天然氣價格下調的正面影響。

天然氣在香港愈來愈重要。政府的目標為2020年，天然氣佔發電燃料組合由現時的25%增至40%。然而，香港將不能再依賴從海南進口崖城天然氣，未來天然氣供應主要透過西氣東輸取得，但據聞後者的價格為崖城天然氣的三倍。因此，有些人可能聯想到，透過從美國進口天然氣，可減低進口天然氣價格，然而需考慮以下因素。

美國政府可能干預價格

美國政府為確保本土石油供應，由第一次石油危機起，開始對原油出口有所管制。主要目的是防止石油公司為了賺錢，把本土生產的石油大量出口，導致本土石油供應不足價格上升。現時美國政府對天然氣出口未有管制，但一旦大量出口天然氣而導致本土天然氣價格上升，當地必定出現反對聲音。美國政府有機會對天然氣出口作出限制，美國天然氣未必可以順利大量出口。

美國如需要大量出口天然氣，需於沿海及港口興建液化天然氣出口站。液化天然氣屬於危險物品，有一定潛在危險性，興建液化天然氣站，迫使附近居民與危險品為鄰，恐會遭受居民反對。這對美國天然氣出口形成一定阻力。

美國出口價格未必比其他出口國為低。美國如大量出口天然氣，需要興建氣管、液化天然氣出口站及購買特別油輪運送液化天然氣，當中涉及龐大的投資金額。為確保出口一方的利益，一般需要簽訂20至25年的長期合約，而且無條件支付合約(take or pay contract)，合約期間即使購買一方不要貨物，亦要支付一定比例的費用。無條件支付合約中的價格不是自由浮動價格，一般會參考油價及其他天然氣出口地區的價格，例如澳洲、中東卡塔爾等，因此其供應價格未必較現時的便宜。

遠水不能救近火

美國天然氣要順利出口非一朝一夕可以達成的事。出口天然氣需要大量相關配套設施，如氣管、碼頭、液化天然氣出口站，建造周期最少需要五至七年，制訂合約亦需時。美國最快到2019年才可大量出口到香港及其他亞洲地區，因此香港短期內難以受惠。

誠然，若美國大量出口天然氣，世界整體供應增加，對價格有一定壓抑作用，但這只是間接的影響及利益。

開採非傳統天然氣對環境的影響仍是未知之數。水力壓裂法對水資源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地下水，由於需要往地下岩層注入大量水及化學物，注入的水會溶解岩層的有害礦物質，污染地下水。另外，亦可能對環境造成其他方面的影響，因此美國非傳統天然氣開發可能因環境問題而被迫放慢生產步伐。

凡此種種，香港、中國內地及亞洲其他地方，短時間內都難以直接受惠於美國的天然氣產量增加。

支持特首依法施政 堅決向反對派說不

張學修 香港海南商會會長 香江聚賢會會長

穩定與發展是香港社會的兩大主線，是主流民意認同的硬道理。梁振英先生及其管治團隊上任以來，積極推出新政，符合民意並獲社會各界肯定。雖然少數政棍對他的攻擊無日無之，但我們亦欣喜地見到，現屆特區政府有目標、有能力、有決心。身為有良知的香港人，在此大是大非面前，為了香港前途與民眾福祉，我們應大膽地站出來，支持特首依法施政，向少數反對派齊聲說不，為香港的繁榮穩定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日前，行政長官梁振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等官員出席地區諮詢會，聽取社會各界對明年《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的意見。這本是關係到經濟民生的頭等大事，可現場卻被反對派騷擾，他們大聲叫囂，嚴重擾亂會場秩序；而縱觀近期的大部分報紙傳媒，如同連續劇般，連篇累牘地報道特首住宅僱建事件；再看看今日的香港：基建項目發展緩慢，民生議題受制於拉布無法通過，只有樓市在乾升，實在是悲哀。

狙擊梁振英 破壞香港穩定

不久前，中共十八大在北京隆重召開。大家不約而同地發現：胡錦濤主席在十八大報告中，清楚表示中央已關注到香港社會的裂痕，並強調國家主權、明確國家認同以及突出行政主導，並提出「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與榮耀」，向「港獨」行為、向干涉香港事務的外部勢力展現出強硬的姿態。這些都與梁振英就任特首以來，香港社會發生的形形色色、令人觸目驚心的事件有關。

細心觀察，不難發現這些事件無一例外地都與少數極端激進的政治勢力扯上關係，他們是令香港社會動盪的始作俑者。這一小撮無聊政棍，只要是有利香港穩定發展的，他們必定破壞，以達到癱瘓特區政府、反中亂港的目的，無論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的人事變動，抑或經濟民生、政策議題，均不惜成本、不計代

價、不分晝夜，一律抗爭到底。而部分政客、新聞喉舌更第一時間附和，扮演代表民意的英雄。於是，簡單的事情複雜化，平靜的香港一次又一次地被撕裂。

千方百計不計代價搞亂香港

部分市民因不滿水貨客滋擾居民，拉高區內物價，卻被別有用心人利用，打着英國米字旗，喊着中國人滾出去，叫囂香港獨立。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只要想起香港淪為殖民統治那一段百多年的恥辱歷史，都會倍感沉痛。但有些人竟不分黑白，聲稱這只是《基本法》賦予港人言論自由的權利。試問：在保持國家領土完整這一大是大的問題上，打着言論自由的幌子就可以埋沒良知嗎？在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前提下，跨越國家安全底線，辯論言論自由有價值嗎？

任何國家，進行德育和國民教育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香港回歸祖國15年了，按照《基本法》成功地落實「一國兩制」，香港人就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了解國情，認識國旗、國歌，接受國民教育乃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個別政治勢力，別有用心教唆年輕幼稚的學生高呼「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唆擺部分市民聚集政總，企圖強姦民意、綁架特區政府，達到癱瘓特區政府的目的，其狼子野心，何其狠毒！

即便是關係香港40萬長者的生活津貼這一德

政，亦連續兩個月都未能在立法會通過，令有需要的長者願望落空。更嚴重的後果是，這班反中亂港之人，以40萬長者生活金綁架政府，挑撥不符合領取津貼資格的長者與政府對立，製造不穩定因素，為社會可能出現的動亂埋下禍根，並將責任歸咎於特區政府。其用心何其險惡！

於新界東北發展新市鎮是關係香港持續發展的重大建設項目，是特區政府順乎民意的重大民生工程，是行政長官落實競選政綱的重大舉措，是解決香港房屋土地供應緊張的重大指標。無論於經濟民生層面，抑或政治社會層面都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該項目已經過長達4年的漫長諮詢期，本應在今年9月結束，可極端激進政治勢力不僅私底下教唆破壞，還公開組織大規模集會，挑撥香港民眾與內地同胞間的對立情緒，擺明要同特區政府一較高下。

新政府有作為 值得市民支持

穩定與發展是香港社會的兩大主線，是主流民意認同的硬道理。梁振英先生及其管治團隊上任以來，積極推出新政，符合民意並獲社會各界肯定。雖然少數政棍對他的攻擊無日無之，但我們亦欣喜地見到，現屆特區政府有目標、有能力、有決心。身為有良知的香港人，在此大是大非面前，為了香港前途與民眾福祉，我們應大膽地站出來，支持特首依法施政，向少數反對派齊聲說不，為香港的繁榮穩定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張學修

有必要改良法定組織委任制度

陳振寧

近日社會熱議有關諮詢及法定組織非官方人員委任上的角色。針對委任人員任期過長、擔任公職過多等問題，特區政府適度調整中策組的職能，以專才作協調和物色人才，向局長提供建議，此舉是嘗試改善現行制度。

政府的目標應是用人唯才，更好地發展香港。暫時從其政治任命官員名單中包括政黨人士、媒體人、學者以至公務員，都可見政府積極搜羅各方面人才。至於諮詢制度是政府網羅人才的重要部分，其成效對政策的醞釀、制訂、推行都有深遠影響，應受政府重視。該制度能否行之有效，關鍵是獲委任的非官方人員能否稱職。所以，政府應關注並改善諮詢及法定組織非官方人員委任的情況，強化吸收人才的能力。

長時間以來，政府在委任諮詢及法定組織的非官方人員時，不時被批評同一人獲多次委任擔任

同一公職，或同一人擔任太多公職。究其原因，該名社會人士可能適合多個政策範疇的工作，或是社會難得的人才，由於政策局之間並無有效協調，所以出現多重委任或委任期過長的情況。

政府已確立「六、六指引」，即「委任非官方成員不應出任同一職位逾6年，以及同一非官方成員不應同時擔任多於6個委員會職務」。但是在實行「六、六指引」時，即使政策局嚴格跟進，但是它們之間都是各自跟進，未能有效協調，這可能出現效果不佳的情況，例如一位出任較多公職的社會人士因為被某政策局更早委任，導致他們未能擔任更能發揮其能力、經驗等的某公職；某政策局原考慮委任一位較適合的社會人士，礙於該人出任較多公職，擱置有關想法，但是原來該社會人士現任公職的任期即將屆滿等。

而且，雖然局長熟悉其政策範疇，對該範疇內

的人才有深入的認識，但是部分諮詢及法定組織除了需要該政策範疇的專才外，也需要其他跨界別專業人士如會計師、律師等。局長可能並沒有足夠時間跨界別物色人才。若然他們能夠獲得更多人才資訊渠道，將令其更有效任用人才。

針對這些問題，政府必須提出改善方法。由於人才發掘不是簡單的工作，加上人才各有專長，諮詢及法定組織的非官方成員數目頗多，政府應設立專責職位，負責協助有關工作。現時政府以中策組為人才資料庫，方便政策局之間作協調，減省物色人才的時間。

必須強調，新一屆政府可按實際需要，改善現行的制度，包括合理地調整中策組的職能，無必要講規曹隨。當然，政府需要進一步向社會解說其調整的理據、新的程序等，以釋除疑慮。至於有關措施的成效，社會可先行觀察，才作判斷。